

《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 学术研讨会综述

宁殿弼

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学院主办的“《三国演义》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于1988年5月19日至24日在祖国宝岛海口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教学、研究人员50余人，向会议提交论文40多篇。

此次研讨会的宗旨是，开拓《三国演义》研究领域，探索研究新方法，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将《三国演义》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内容作为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到当今现实中来，以推动古典文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书人物缺少对人的本身的深化、对人的本性的开拓，作者对人物理解和表现单一化，性格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静态的线性因果关系之中，人物没有思想斗争和内心矛盾。无论曹、刘、关、张、诸葛亮，其性格几乎都是一种政治化了的社会性格。因而《三国演义》人物典型不是个性化的，而是类型化的。因人物主要特征被高度强化，将某一性格特征理想化、夸大化，故这些形象尽管属于类型，但给读者印象相当强烈，仍然拥有很高的思想意义、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该书之所以采用类型化写法有深刻的时代原因：类型说是人物形象理论和实际发展的一个不可超越阶段，它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适应。从人类思维法则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可以看到该书成书年代关于典型本质的认识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及其所造成审美观念的递嬗是相一致的。有的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三国演义》从发展、对比、矛盾中刻画人物性格，其人物虽有共性的一面，但大多数人物的个性是突出的，是性格化的，因而是典型化的，不能用西方文艺理论关于从类型化发展至典型化的规律硬套于中国古典小说。还有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对人的认识和把握，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从外部规定去认识人的局限，触及到了人的个性特点和个性结构。但是由于受宋代理学的浸润，该书对人的认识和把握更偏重于伦理观念、人格观念方面的规定和制约，而对个性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则有所贬抑，因之全书基本上仍停留于“英雄人”的阶段，没有完成由“英雄人”到“一般人”的突破。

二、关于研究方法问题。与会者一致指出，近年来《三国演义》研究领域有了新开拓、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如从文化学、心理学、比较文学角度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三国演义》不是一般小说，而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小说，它的研究的独特处在于有很大应用价值。国外，例如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已运用到现代化管理上，很有实绩，日本有的公司领导说他们的成功是《三国演义》指导的结果。我们更没有理由不重视其应用研究。《三国演义》研究突破乾嘉学派的考据和以社会学为主的传统模式，是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研究古典文学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为现实服务，合上时代节拍。衡量研究价值，也要看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三国演义》研究的针对性、当代性、现实感，把对它的应用研究用于现代管理和竞争，无疑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会起积极作用。诚然应用研究也是对本体研究的开拓，应用研究不能脱离作品所提供的东西，不能脱离作品本身，故而本体研究亦不可忽视，要立足于文学，视野在文学之外。文学研究、美学研究、应用研究三者不分高低，不可偏废。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各种研究方法、传统方法和新方法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通的、互补的。《三国演义》的内容既牵涉到诸多方面，研究自然不能拘守于一隅。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不能仅限于文学工作者，还要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外贸、旅游甚至气功等各方面学者、专家或工作者参加，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始能穷其奥妙，发扬光大。加强古典文学研究不单有个方法问题，更须更新观念，集纳新思潮，寻找新的理论体系和

理论武器。

三、关于《三国演义》中的智谋与现管理。与会者们认为,《三国演义》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宏伟画幅与知识集萃,经营管理学、人才学、领导艺术学的形象化的教科书。智谋是《三国演义》表现的中心。如果我们不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军事斗争或政治斗争上,而把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领袖人物的重大决策的成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放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放在各种现代化管理的决策探讨中审视,那么《三国演义》的决策理论与实践,必然会给我们搞好改革以有建设意义的启示和借鉴,起到“古为今用”的宝贵作用。三国时代人才之众,在中国古代史上亦属罕见,

《三国演义》里描写的用人艺术,诸如用人与兴亡、用人特点、用人鉴诚、御人术、知人美谈、荐贤轶事、人才在整体运行和发展中的整体效应等等,构成了一部用人艺术的百科全书,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在今天改革、开放、竞争的时代,一切弄潮儿、改革者、领导者、有志才人都会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值得研究者认真发掘。《三国演义》的智谋还体现在领导艺术上,诸如审时度势与顺天应人的应变能力、集思广益、多谋善断、能柔能刚、有胆有识、举贤授能、知人善任、协调人际关系、以德服人、言信行果等,对于今天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刚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金瓶梅》语释

掠兽头何以丢丑

卞 继 卜

读新人文本《金瓶梅词话》,见42回“爱奴儿撮着兽头城往里掠,好个丢丑的孩儿!”不明“兽头城”为何物,往哪里掠便“丢丑”?疑有误,比勘日本影印本,原句为“爱奴儿撮着兽头城以里掠”,方始明白:是断而不当致误。“城”不应上属作“兽头城”,而应属下作“城以里掠”。所撮所掠的是“兽头”而不是“兽头城”,城是无法撮与掠的。新人文本对“城以里掠”的“以”,不明所以,改从“往”作“往里掠”;其实,“以”字并非衍文,也不误,以字明指向,“城以里掠”即往城里掠。改以为往,则指向难明了。新校本谓所据是崇祯本,检崇祯系统的张评本此句是“撮着兽头往城里掠”。撮的也是兽头,掠向也是城里。虽然句义明畅,然而失却了词话本“城以里掠”唇吻的口语色彩。

掠即丢,掠兽头何以丢丑?因兽头为丑物。但不是魏子云先生所释的“兽形(面具)头脸”。兽头,蹲踞屋脊的龙之九子之一的螭吻。明·杨慎《升庵外集》言龙之九子“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又作蚩尾鸱吻,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载“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者,水之精,能辟火,可置之殿堂,今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鸢,遂呼之为鸱吻。”《红楼梦》大观园正殿即是“金辉兽面,彩焕螭头。”依上说,因兽头貌丑,置之屋脊以作镇物;因其丑,遂衍生出掠兽头丢丑的俚语。也因其丑常作贬语,贬抑卑劣猥琐之人,今语仍存,与今语“狗头狗脑”差当。《红楼梦》贾环所制之谜语“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爱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谜底是枕头与兽头。虽然不是贾环的自况,然兽头的猥琐和枕头的草包,他倒是兼而有之;贾环正是掠兽头的“好个丢丑的孩儿”。在导致贾家败亡上,有可能充当了“兽头”的角色;作者并未明写,测隐则须探佚家们去完成了。

1988.4.8

